

冷戰時期台港文化生態下 台灣女作家的論述位置 ——以《大學生活》中蘇雪林與謝冰瑩 為探討對象

王鈺婷

國立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副教授

中文摘要

《大學生活》為美援文化推動下友聯機構所出版之刊物，本文鎖定目前學界未有具體研究成果之《大學生活》，以論證五〇年代台灣女作家於冷戰背景下，透過香港之中介，於《大學生活》中發表相關創作，並由此介入冷戰時期台港文化生態之中。本文將台灣女作家於《大學生活》之創作身分定位為「知識女性」，先參酌「交織性理論」(intersectionality)之概念與研究方法來評論蘇雪林與謝冰瑩的論述位置，以再思國族、階級與性別之交會，並突出國族論述與文化冷戰自有交織變項之脈絡，以此挖掘出蘇雪林與謝冰瑩論述位置之複雜性，來詮釋出台灣女作家在當時自由中國文藝體制，以迄東南亞華文教育中所扮演的獨特角色。《大學生活》以東南亞華僑青年為重要的文化宣傳對象，蘇雪林與謝冰瑩在此一刊物中身兼青年學子精神導師與文化教育傳承工作，以傳播文學與推廣文藝觀為

己任，造就獨樹一幟的特色，不僅拓展了台灣女性文學的版圖，在多重論述位置中進行自我定位，並型塑出具有時代意義之女性文學範式。

關鍵詞：《大學生活》、友聯出版社、知識女性、蘇雪林、謝冰瑩

**The Discursive Positions of Taiwan-based
Women Authors During the Cold War Era:
An Exploration of the Works
of Su Hsueh-Lin and Hsieh Ping-Ying
Published in “University Life”**

Wang, Yu-Ting

Associate Professor,

Institute of Taiwan Literature,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Abstract

“University Life”, a periodical published by Hong Kong’s Union Press during the era of U.S. aid culture, has largely been overlooked in scholarly research on the literature of this period. This paper examines works written by Taiwan-based women authors and published in “University Life” during the 1950s in order, firstly, to discuss the nature and character of the creative efforts of these writers, as influenced by the contemporary Cold War milieu and by the filter of being accepted and published in an overseas Chinese publication, and, secondly, to further examine the Taiwan-Hong Kong cultural ecology during the Cold War era. These authors are treated in this paper as female intellectuals. The concept of intersectionality and

appropriate research methods are applied firstly to critique and delineate the positions of two authors, Su Hsueh-lin and Hsieh Ping-ying, and then to consider the intersections among nationality, class, and gender. The natural intersections thus elucidated between contemporary national discourse and culture and the Cold War, respectively, are used to reveal the complicated nature of the positions of these two authors and then, subsequently, to interpret the unique role played by Taiwan-based women authors in influencing contemporary Chinese education in Southeast Asia within the context of Taiwan's "Free China" literary and artistic institutions. The target audience of the cultural messaging in "University Life" was primarily overseas Chinese youth living in Southeast Asia. Thus, in terms of their contributions to this publication, Su Hsueh-lin and Hsieh Ping-ying served both as spiritual advisors to overseas Chinese youth and as cultural educators, promoting core perspectives on literature and the arts. This unique role brought new audiences to Taiwan's women writers and new opportunities to define themselves in a myriad of discursive positions as well as created a new paradigm for women's literature that reflected contemporary realities and needs.

Key words: University Life magazine, Union Press, female intellectuals, Su Hsueh-lin, Hsieh Ping-ying

冷戰時期台港文化生態下 台灣女作家的論述位置 ——以《大學生活》中蘇雪林 與謝冰瑩為探討對象*

一、前言

本文以友聯出版社在香港所發行的《大學生活》(*College Life*)為觀察對象，以此一具有代表性之刊物，來探討五〇年代台灣女作家在《大學生活》中所呈現的多重論述位置。五〇年代美新處所扶植的香港出版機構中友聯出版社頗具有代表性，是為香港第三勢力組織所支持的出版機構。友聯所出版的刊物，包括《中國學生周報》(1952年7月-1974年7月)、《祖國周刊》(1953年1月-?)、《大

* 本文為科技部計畫「香港文學場域中的「台灣」——以五〇至七〇年代台灣女作家與香港文壇的關係研究與區域連結為思考架構」(I)(MOST 104-2410-H-007-059-)之部分研究成果，並感謝投稿期間審查委員之寶貴意見。本文初稿發表於「Women, Media and Literature in a Global Context」(Workshop, 德國海德堡大學漢學系主辦, 2016年7月5日), 感謝會議主辦人德國海德堡大學漢學系 Barbara Mittler 教授, 並感謝會議期間海德堡大學漢學系博士生陳正維的協助。修改稿發表於「世界華文文學區域關係與跨界發展」國際學術研討會(浙江大學海外華人文學與文化研究中心、浙江大學中國現當代文學與文化研究所、中國藝術研究院《文藝研究》編輯部主辦, 2017年4月7-9日), 感謝會議主辦人浙江大學海外華人文學與文化研究中心金進教授與論文評論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與文學系樊善標教授; 增補稿發表於「異域、他國與世界想像: 近現代文學與文化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清大中文系主辦, 2018年12月27-28日), 感謝會議主辦人清華大學中文系顏健富教授與論文評論人交通大學社文所劉紀蕙講座教授。最後感謝清大台文所謝世宗教授與清大台文所博士生吳文對於論文之閱讀, 並給予修改建議。

學生活》(1955年4月-1971年7月)、《兒童樂園》(1953年1月-?)等刊物，從發刊目的、刊物定位、讀者群設定與編輯方針，可看到友聯在位居戰略地位的香港，於文化冷戰的背景下以多元的文化宣傳策略，來與共產中國文化宣傳進行對抗，並型塑出美援刊物之網絡。《中國學生周報》與《大學生活》這兩份以學生為名的刊物，最初目標是為流亡於東南亞一帶的中國青年而編，欲透過文化宣傳來凝聚青年力量。《大學生活》是以海內外大專青年學生為主要讀者群的綜合性刊物，並且在台灣戒嚴體制之下提供跨地域的發表平台，也是當時台灣作家發表的重要管道。

《大學生活》自五〇年代中期至七〇年代初期歷經階段性變化，初期是在民族情感和文化使命下創辦刊物，以香港殖民地地下保存民族意識與傳統文化為號召¹；六〇年代注入更多西方文化，包括哲學、藝術、文藝等思潮的介紹，更強調塑造大學生的現代文化意識此一面向。台灣女作家於《大學生活》上發表之鼎盛期在其創辦初期，於此發表的女作家，包括謝冰瑩、蘇雪林、鍾梅音、郭晉秀、郭良蕙、童真、琦君、張秀亞、林文月、晶心、陳若曦、瓊瑤等人，大多集中在前五卷，後期只有陳若曦在第六卷登場。這些女作家有所屬不同世代與文學陣營的差異，包括：謝冰瑩、蘇雪林、鍾梅音、郭良蕙、童真、郭晉秀、張秀亞所屬五〇年代遷台外省女作家陣營；晶心、陳若曦、林文月所代表的六〇年代台大學院派青年女作家；以及瓊瑤所代表的六〇年代台灣通俗女作家，其中並以五〇年代遷台外省女作家為最大多數，反映出當時台灣女性文學社群的集結。五〇年代女作家於《大學生活》創辦初期頻繁發表，這批以寫作為長期活動、創作力豐沛的台灣女作家，也意外打開台灣女性創作的發表空間，並牽繫起台港文學交流的管道。

在《大學生活》強調文化中國傳承使命的創辦初期，台灣女作家以香港為中介，以《大學生活》為發表之重要海外陣地，這群在范銘如研究中標舉為「台灣女性中文小說中列為『第一代』」的女作家們²，其作品於《大學生活》中刊載，也具有女作家所代表的性別以及文化政治表徵。本文將從「交織性理論」

¹ 盧瑋鑾、熊志琴編，《香港文化眾聲道2》(香港：三聯，2017年)，頁25。

² 范銘如，《眾裡尋她—台灣女性小說縱論》(台北：麥田出版，2002年)，頁51。

(intersectionality) 之概念與研究方法³，去討論多重因素及其交織如何有助於開展《大學生活》中五〇年代台灣女性文學研究的課題，再思族群、性別與之交會，並強調突出冷戰文化脈絡中自有交織的變項，以此管窺五〇年代台灣女作家在當時台港文化生態中扮演之角色⁴。

本文將台灣女作家於《大學生活》之創作身分定位為「知識女性」⁵，並參酌「交織性理論」之研究方法，來評論蘇雪林與謝冰瑩的論述位置，以此挖掘蘇雪林與謝冰瑩論述位置之複雜性，並深化性別研究的面向。台灣五〇年代女作家群中，蘇雪林與謝冰瑩是頗富盛名的，其擔任中國文藝寫作協會、台灣省婦女寫作協會等重要文藝團體的幹部，堪稱當時女作家的領袖人物。此外，1920年代末以迄1930年代名列五四女作家之列，而後躍居文壇的蘇雪林與謝冰瑩，其主體具有五四時期女性解放思潮，展現出女性自我意識。蘇雪林與謝冰瑩其生命歷程也與大時代緊密結合，由大陸至台灣，在國民黨政府大力宣揚國語運動和復興中華文化的時代，留下豐富的創作，作品也在台灣、香港、馬來西亞等地發表。本文將透過香港友聯出版社出版的刊物《大學生活》中蘇雪林與謝冰瑩所發表的作品，來開啟探討其之多元視角，蘇雪林與謝冰瑩在此一刊物中身兼青年學子精神導師與文化教育傳承工作，以傳播文學與推廣文藝觀為己任，造就獨樹一幟的特色，不僅拓展了台灣女性文學的版圖，在多重論述位置中進行自我定位，並型塑出具有時代意義之女性文學範式。

³ 衣若蘭，〈論中國性別史研究的多元交織〉，《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第30期（2017年12月），頁167-228。

⁴ 學界對於現代主義美學典律，與剛性體制和柔性體制所型塑的文藝體制所交織的建構模式有所探討，詳見陳建忠與王梅香的研究。陳建忠，〈美新處（USIS）與台灣文學史重寫：以美援文藝體制下的臺、港雜誌出版為考察中心〉與〈冷戰與戒嚴體制下的美學品味：論吳魯芹散文及其典律化問題〉，皆收於《島嶼風聲 冷戰氛圍下的台灣文學及其外》（台北：南十字星，2018年）；王梅香，〈美援文化體制下的《文學雜誌》與《現代文學》〉，《台灣文學研究學報》第25期（2014年12月），頁69-100。

⁵ 知識女性的相關研究，羅秀美的研究具有代表性。見羅秀美，〈小說家之外的孟瑤——從「女性散文」與「孟瑤三史」論其文學史定位〉，《興大人文學報》第51期（2013年3月），頁197-240。

二、《大學生活》與「中國文化再生運動」

1955年4月創刊的《大學生活》為綜合性刊物，舉凡學術論文、讀書心得、書刊評介、遊記散文、文藝創作、名著翻譯、報導通訊、漫畫、木刻、圖片，均歡迎投稿。《大學生活》創刊號之發刊詞〈生活與「大學生活」〉中，首先闡釋生活的多面向，繼而申論「大學」與「生活」之間的關係，提出大學生活是重要的轉捩期⁶，並舉出創辦的目的正是為培養大學同學正確的生活態度：「為了協助大學同學致力學問與修養，對生活有更確當的認識。」⁷在《大學生活》的編後語〈一份關懷，一份愛〉再次將《大學生活》定位為「由大學同學自己編，給大學同學們自己閱讀的刊物」⁸。《大學生活》刊物的範圍包羅萬象，包括論說、人物、學校介紹、通訊、文藝等，刊登「大學同學應該知道的，對大學同學有益的事物」⁹。

《大學生活》面對共產主義、冷戰、現代性和移民潮的國際動態環境，其創辦動機更顯複雜，表面上是以香港此一安全又中立的地方，作為反共產主義的根據地，主要的目的是在共產勢力之外教育中國青年，也透過型塑大學生的「想像共同體」，以整合大學生對於中華民族的認同。值得注意的是，1950年代初期美國以文化冷戰為策略，是以培訓全球性的知識菁英為重點¹⁰，這也影響友聯出版社的工作方向，特別是友聯創立的宗旨是以「影響華僑社會，教導自由世界（尤其是東南亞）的中國青年，使他們認清共產主義和共產統治的真相，與東南亞其他人民全心合作，以對抗共黨的顛覆活動」¹¹。《大學生活》強調相較於鐵幕裡青年擁有「自由」的權利，其編後語以「自由」為敘述重點，以區分鐵幕青年與自由世界中國青年擁有「這份自由」的差異，並以自由中國

⁶ 編者：「除了知識的追求以外，理性底訓練，感性底陶冶，靈性底培養，大半須得力於這一段生活；同時，健全的生活態度，和適宜的發展傾向，也是這一時期的培養產物」，見編者，〈生活與「大學生活」〉，《大學生活》創刊號，（1955年4月），頁2。

⁷ 同註6。

⁸ 編者，〈一份關懷，一份愛〉，《大學生活》創刊號（1955年4月），頁48。

⁹ 同註8。

¹⁰ 周愛靈著，羅美嫻譯，《花果飄零：冷戰時期殖民地的新亞書院》（香港：商務印書館，2010年），頁76-85。

¹¹ 也斯，〈解讀一個神話—試談《中國學生周報》〉，《讀書人月刊》26卷4期（1997年4月），頁65-75。

青年學生為閱讀對象，其發行的地區涵蓋香港之外其他「自由」的地區，包括：台灣、日本、美國、馬來西亞、菲律賓等地。

《大學生活》中提供整合大學生的中華民族認同之思想奧援來自於新亞書院，尤其創辦「友聯」的年輕知識分子都和新亞書院關係密切¹²，除了新亞書院的創辦人錢穆、唐君毅及張丕介對於「友聯」的年輕人十分欣賞，「友聯」許多編輯也來自於新亞書院，他們深受新亞書院創辦的宗旨所影響，並以傳播與發揚新亞的文化價值觀為使命。新亞書院的課程都以保存與推廣中國文化為主，並促使學生在集體文化身分和行為實踐上覺知¹³。「友聯」的文化人也認同推動文化教育的重要性，認為文化教育能塑造新一代的思想，並能強化中國文化身分認同，「友聯」對外宣傳的理念為民主中國，以民主政治、公平經濟和文化自由¹⁴，來更新中國文化的精神，由此可知，「友聯」的理想和「新亞」的精神在大方向上是相似的。《大學生活》創刊號主編古梅，也是《中國學生周報》同人，在古梅身上新亞書院的精神和友聯的精神是合一，古梅自陳：「我相信若文章是鼓吹獨裁、摧毀個人的尊嚴與自由或盲目打倒優秀的中國文化，我是不會刊登的……¹⁵」古梅編輯《大學生活》時也向象徵新亞精神的唐君毅與錢穆邀稿，《大學生活》四個字是請新亞教授，也為名書法家曾克崙題字。

值得注意的是，《大學生活》創刊號中，新亞書院創辦人錢穆的〈在現時代怎樣做一個大學生？〉也為大學生精神定調。本文勾勒出儒學大師錢穆對於大學教育的看法，環繞在他所思考的「民族自救」的議題上，也賡續錢穆所傳承的文化使命。在〈在現時代怎樣做一個大學生？〉，錢穆在流亡的際遇中鋪陳大學生的相關脈絡，以重申自由主義與共產主義是對立的立場。錢穆指出當前的大學生們不該以謀求職業和解決個人衣食生活來做為進入大學的唯一目標，而是將視野放在理想的前途，以人類的前途為福祉¹⁶。

¹² 《大學生活》目錄頁所示督印人為楊遠，編輯者為古梅、楊遠、陳特、甘美華、孫述宇。《大學生活》1卷7期（1955年11月）。

¹³ 同註10，頁21-66。

¹⁴ 盧瑋鑾、熊志琴編著，《香港文化眾聲道1》（香港：三聯，2014年），頁86。

¹⁵ 古梅在「友聯」有其文化任務，負責學生工作，主要與《中國學生周報》海外各地通訊員寫信聯繫，以促進校際溝通。同註14，頁88。

¹⁶ 錢穆，〈在現時代怎樣做一個大學生？〉，《大學生活》創刊號（1955年4月），頁3-5。

延續錢穆在〈在現時代怎樣做一個大學生？〉所論及的理想前途，《大學生活》於創刊一周年也以「中國文化再生運動」來做為努力的方向，此一運動延續五四運動所揭示的兩大目標—民主與科學，以喚醒青年們歷史責任，並促成中國復興：

一個文化的再生運動，決不是一件簡單的事。但是經過海外自由學人六七年來艱困的探索與締造，已開拓了明確的道路。至少我們可以把握左列三個基本觀念：（一）人文思想；（二）民主觀念（包括民主自由與人權）；（三）科學精神與方法。¹⁷

中國文化再生運動，將中華文化的論述為核心加入西方的元素，並回應《大學生活》創辦的旨趣——通過青年人之思想和生活，以鑄塑中國民主社會的典型人格¹⁸。綜觀之，「中國文化再生運動」，貫徹民主科學的知識，以提倡自由與人權，來塑造大學生現代文化思識，並進行中國民主社會的重塑。《大學生活》透過「中國文化再生運動」的推動，也將自我定位為「中國文化運動中的一面小旗」¹⁹，《大學生活》欲透過文化宣傳的力量，凝聚僑居海外的大學生，此一大學生也被視為中華文化的傳承者，與溝通中西文化的中介者。在冷戰大背景下，五〇年代台灣女作家在《大學生活》構築了一道獨特的文學風景，以下將以蘇雪林與謝冰瑩為例，探究台灣女作家在《大學生活》中所發表作品具有文化政治意義，並回應五〇年代台灣女作家在台港文化生態所扮演的角色此一議題。

三、蘇雪林之多重論述位置

在《大學生活》發表作品的女作家中，蘇雪林無疑是頗具代表性的一位，蘇雪林在《大學生活》發表散文、小說、文學批評、神話研究等，寫作範圍十

¹⁷ 本刊，〈努力的方向—紀念本刊一周年〉，《大學生活》1卷12期（1956年4月），頁3。

¹⁸ 本刊，〈新人格與新社會—新年的回顧與前瞻〉，《大學生活》1卷9期（1956年1月），頁3。

¹⁹ 同註18。

分廣闊。身為新文學第一代女作家的蘇雪林，聲名顯赫，在三〇年代即以散文集《綠天》（1928）和自傳體小說《棘心》（1929）載譽文壇，與冰心、丁玲、馮沅君、凌叔華等並稱「五大作家」，然而蘇雪林的文藝創作以《綠天》和《棘心》最為知名，蘇雪林相關評價都集中在《綠天》和《棘心》兩部作品之中，來到台灣之後創作的評述較少，也未受到台灣文壇與評論界的關注。箇中原因，其一為來台之後蘇雪林首重鑽研屈賦，次為文學研究，除了回憶錄與雜文之外，文藝創作較少²⁰；其二為台灣文壇對於蘇雪林之刻板印象，將蘇雪林視為保守派，陳昌明指出象徵詩論戰中蘇雪林對於新詩保守的立場²¹，與郭良蕙「心鎖事件」中蘇雪林具有思想與道德行為上潔癖的一面，也讓台灣文壇將蘇雪林視為傳統守舊²²；其三為蘇雪林在國民黨文藝政策所扮演的特殊角色，陳芳明曾經論及蘇雪林的發言立場幾乎都是從國民黨文藝政策出發²³，同一時間蘇雪林也在國民黨文藝組織，如台灣省婦女寫作協會扮演舉足輕重的領導者角色，也由於蘇雪林的「官方」立場，並且自謂其後半生事業都在反共反魯，使得中國大陸 1940 年代以後評論蘇雪林的文章很少²⁴，直至 2001 年後中國大陸才有為數不少研究蘇雪林的碩博士論文²⁵。

在此將「交織性理論」視為一重要的研究視角，或是為一方法論，首先要進一步思索蘇雪林論述位置之多重範疇（因素）及其交織。經歷五四思潮，追求人文自由主義精神的蘇雪林，可視為民初進步女性的典範，蘇雪林身上展現出女性勇於對抗舊時代家庭對於女性的桎梏，以及在傳統禮教與追求獨立自主新思潮之間的矛盾與衝突，例如蘇雪林經歷中所呈現出女性身分與傳統禮教之間的複雜關係，劉乃慈提出蘇雪林筆下展現的是「現代中國知識分子在主體追尋以及建構過程中，對於各種愛的探索、體驗以及試練」²⁶，認為《棘心》一

²⁰ 陳昌明，〈蘇雪林研究綜述〉，收於封德屏總策劃、陳昌明編選，《台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 51 蘇雪林卷》（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2014 年），頁 134。

²¹ 同註 20，頁 134-135。

²² 同註 20，頁 134-135。

²³ 陳芳明，《台灣新文學史》（台北：聯經，2011 年），頁 271。

²⁴ 同註 20，頁 127。

²⁵ 同註 20，頁 129。

²⁶ 劉乃慈，〈愛的歷程——論《棘心》的行旅書寫〉，收於同註 20，頁 201。

作「少了五四文學習見的對立與反抗，唯有更多不能自己的妥協與感傷」²⁷，提出《棘心》展現出中國知識分子複雜幽微的情感歷程；蘇偉貞坦言《棘心》有不少小說藝術上的缺失，但貴在蘇雪林的性別主體言說之真誠：「蘇雪林的有話要說，且說的誠懇流暢執著，自有不可輕忽的時代意義。」²⁸吳達芸也認為蘇雪林於《棘心》中賦予醒秋於「反封建」時代而能做出「反反封建」的抉擇，在於其抉擇為「女性自主的展現」²⁹，《棘心》可視為受到五四新文化衝擊的蘇雪林對於這一波運動的回應，也可以說是蘇雪林自我理念的申明，是蘇雪林用女性經驗對於親情、國族抑或是宗教領地所發出的初步探討，彌足珍貴，而再思蘇雪林論述位置的動態圖象中，其遷台後性別身分的調整，更是可以從《大學生活》中蘇雪林的發表作品，來一窺這其中的複雜面向。

其次，可以看到戰後蘇雪林受到國家機器的注意，被塑造成為忠黨愛國的新女性代表，也在國族論述的主導詮釋，與美新處宣傳自由中國文藝下，被視為代表當代自由中國文藝的重量級作家。1955年李文於美國新聞處所扶持的亞洲出版社出版之《當代中國自由文藝》，其中特別針對自由文藝運動的發展過程、海外自由文藝運動（包括對於香港自由文藝運動檢討、旅菲華僑作家及作品）、台灣自由文藝運動的理論體系及運動弱點與發展方向一一進行梳理，以促使文藝工作者痛定思痛、配合時局，展開自由文藝運動³⁰。李文將自由文藝運動視為五四文學運動的一脈相承，以提出自由文藝運動傳承自五四新文學運動中「自由、民主、科學」的口號，並闡發文藝創作與文化活動之自由³¹。李文將蘇雪林與胡適、林語堂、陳西滢、徐訏、李輝英、張愛玲、王平陵、謝冰瑩、陳紀滢、錢歌川、陳紀滢等並列為文藝界知名人士，肯定其善盡推動與培養自由文藝文化運動之責任³²。由上所述，蘇雪林側身於當代自由中國文藝之列，蘇雪林具有難以動搖、無可取代之地位，特別是她身上具有實踐五四新文學

²⁷ 同註 26。

²⁸ 蘇偉貞，〈五四遺事：當愛情降臨（中國）——論蘇雪林《棘心》、《綠天》及同代女作家的情愛敘事模式〉，收於同註 20，頁 226。

²⁹ 吳達芸，〈高貴的人生抉擇——解讀女性自傳小說《棘心》〉，收於同註 20，頁 174。

³⁰ 李文，《當代中國自由文藝》（香港：亞洲出版社，1955年），頁 1。

³¹ 同註 30，頁 1-11。

³² 同註 30，頁 8。

運動精神，與推動當代自由中國文藝的複合身分，是五〇年代女作家的典範人物。

其三為蘇雪林 1952 年 7 月自法國抵台，任教於台灣省立師範學院（今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講授國文及楚辭，其後於 1956 年 10 月任教於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並於 1957 年於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增授屈賦課程，此一階段蘇雪林的創作以論述為主，其屈賦研究與文學史研究並重，並於《中國一周》、《文藝創作》、《中國語文》等期刊發表其學術研究，在此蘇雪林身兼青年學子文學研究導師與文化教育傳承工作，有其重要的開創性，其中可見蘇雪林「知識女性」的面向。在此以「知識女性」定義蘇雪林，主要是著眼於蘇雪林所具有「知識女性」的雙重面向，包括文學創作與學術創造兩項能力³³，如同羅莎琳·邁爾斯（Rosalind Miles）指出知識女性是以作家和學者為主要身分認同，其寫作能力和知識創造力是其通往未來與自由的路，並以知識創造力「努力破除限制人類思想與溝通的刻板印象（stereotypes）和化約式的類別（reductive categories）」³⁴，而這也正是以科學考證的方式進行學術研究，奠定屈賦研究新路線的蘇雪林一直致力的工作。

以上將蘇雪林的多重身分置入交織分析之中，可以看到多元因素並置的觀察對於蘇雪林研究的必要性，及交織性理論及其與蘇雪林多重論述位置之關係，特別是蘇雪林的位置，有其多元的協商，包括性別、國族、學者等身分之調整，並以此突顯蘇雪林於當代自由中國文藝中「知識女性」的形象。蘇雪林在《大學生活》中發表為數頗多的作品，一則是身為教授學者的蘇雪林對於自己獨闢蹊徑學術研究的研究成果，回應《大學生活》所標榜智識分子所學與所志的崇高性，以實踐知識技能與理想抱負的結合³⁵；一則是蘇雪林所發表的寓言體小說。

³³ 同註 5，頁 201。

³⁴ 羅莎琳·邁爾斯（Rosalind Miles）著，刁筱華譯，〈一些學識〉，《女人的世界史》（台北：麥田出版，2006 年），頁 182。

³⁵ 本刊，〈大學生之所學與所志（大學論壇）〉，《大學生活》1 卷 6 期（1955 年 10 月），頁 2。

前者包括〈我怎樣開始研究屈賦〉³⁶、〈中印文學關係研究跋〉³⁷、〈論中國舊小說〉³⁸等研究著作。〈我怎樣開始研究屈賦〉是蘇雪林闡釋耗費畢生精力研究的學術領域楚辭的研究心得，在此蘇雪林以淺顯易懂的方式剖析對於文理深奧的楚辭之研究路徑，以提供研究入門者為學之道的參照。蘇雪林提出屈賦中許多神話和典故，必須透過比較研究的方法才能使其顯露真正的意涵，蘇雪林揭示如何透過引用域外資料與搜求中國典籍並置的方式，以旁徵博引的方式來探悉屈賦的創作理念及其原形意象，特別是屈賦中神話故事與希臘羅馬的神話相類，以回應蘇雪林所提出「中西文化同源論」的觀點³⁹。〈論中國舊小說〉⁴⁰，通過歷史的反思、客觀的探討中國舊小說的面貌，文字清晰，簡要說明中國舊小說文體發展的因果脈絡，具有文學史的重要意義，為蘇雪林對於中國文學史研究心得之展現。而不論是〈我怎樣開始研究屈賦〉，或是〈論中國舊小說〉，呈現出蘇雪林學術思考的向度，有啟迪《大學生活》中廣大學生讀者的意涵，也是蘇雪林知識女性形象之展現。然而，這些研究著作，能夠置入《大學生活》文化冷戰的宣傳結構中，有多重的意義，其一為展現出蘇雪林不同於馬列主義及毛澤東思想的文學史觀，相較於馬森從「另類」（alternative）角度來分析蘇雪林《中國二三十年代作家》，和王瑤的《中國新文學史稿》以降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主導思想相較的反主流性⁴¹，此一蘇雪林「右翼」學術研究的展現，有對於中國文化與民族性的審視，具有文化歷史傳承的使命，也恰好符合美新處希望透過政治的力量，宣傳自由中國的文學之面向；其二為蘇雪林具有跨文化思想的背景，其中包括蘇雪林早年受到儒家思想的洗禮和具有天主教的背景，以及留法期間浸淫歐陸的知識體系，也影響蘇雪林以獨特中西比較文學研究取徑來詮釋《屈賦》⁴²。蘇雪林的研究也表徵上個世紀具有跨文化背景的知識女性，在中西思想背景下來回穿

³⁶ 蘇雪林，〈我怎樣開始研究屈賦〉，《大學生活》1卷3期（1955年6月），頁12-16。

³⁷ 蘇雪林，〈中印文學關係研究跋〉，《大學生活》4卷10期（1959年2月），頁39-44。

³⁸ 蘇雪林，〈論中國舊小說〉，《大學生活》5卷1期（1959年5月），頁3-14。

³⁹ 同註36。

⁴⁰ 同註38。

⁴¹ 馬森，〈一種另類的現代文學史觀——論蘇雪林教授《中國二三十年代作家》〉，收於同註20，頁338。

⁴² 蔡玫姿，〈蘇雪林《棘心》呈現的文化躁狂與療癒空間〉，收於同註20，頁398。

梭所留下論辯的心靈圖景，其中也回應《大學生活》中「中國文化再生運動」中對於中西知識體系之融貫，來引導大學生對於現代文化思識與自我志向之探索。

此外，蘇雪林在《大學生活》所發表的作品〈卜賽芬的被劫〉⁴³和〈銀蝶〉⁴⁴，可以看到蘇雪林政治立場與思想傾向，其中〈銀蝶〉此一寓言體裁的小說，是蘇雪林多重論述位置之展現，頗值得探索。〈銀蝶〉為收錄於1955年於台灣重新出版的《綠天》中的〈小小銀翅蝴蝶故事〉第二篇，此書為1928年《綠天》的增訂版，以記錄新婚生活的小品文為主的《綠天》，在二、三〇年代發表之時，受到廣大青年讀者之喜愛與共鳴⁴⁵。1955年增訂版《綠天》發表之時，為蘇雪林結婚三十周年，也藉此紀念珠慶之婚，並寄託對於陷身竹幕的另一半康之憂慮與懷念⁴⁶。〈小小銀翅蝴蝶故事〉第二篇〈銀蝶〉具有蘇雪林自傳性成分，在此需要留意的是自傳的複雜性，作品所潛藏作者的自我表述，其中所涉及個人小敘事與宏大歷史敘事之間的對話與折衝。

〈銀蝶〉前半部描述銀翅蝴蝶在結婚一段時日之後感覺到婚姻不甚協調，和講究實利主義的蜜蜂因性格差異而分居，而後雖受到不同愛慕者之示愛，卻也在其中躊躇與思辨愛之意義，在男女之愛與親情之愛之間反覆琢磨，並決定與姊姊黃裾蝶同居，展現出蝴蝶心路思索的過程，頗有在蝴蝶身上寄託女性主體自我的追尋。小說的後半部則回到國民黨官方文藝政策與美方冷戰反共宣傳之主調，包括刻劃大風突起將繡原上的花草昆蟲打得七零八落，死傷無數，以此引喻八年對日抗戰⁴⁷；第二陣大風，來自赤色蝗蟲的風暴，由於銀翅蝴蝶的故鄉常鬧蝗災，此次蝗蟲風暴之劇烈，攻下赤蝗王國，蘇雪林描述蝗災之慘烈，頗符合反共的主流論述：「殺！殺！殺！這是錢塘八月潮的怒吼，是沙漠旋風的

⁴³ 蘇雪林，〈卜賽芬的被劫〉，《大學生活》1卷9期（1956年1月），頁59-64。

⁴⁴ 蘇雪林，〈銀蝶〉，《大學生活》1卷5期（1955年9月），頁52-60。

⁴⁵ 蘇雪林提出：「乃由於作者那顆永久童心所流露的單純的思想，和真摯的情感，能夠引起世故未深的青年讀者心絃的共鳴，亦未可知。」蘇雪林，《綠天》（台北：今日婦女半月刊，1955年），頁2。

⁴⁶ 同註45，頁4。

⁴⁷ 錢歌川，〈玲瓏剔透的瓔珞——蘇雪林《綠天》讀後感〉，收於同註20，頁162。

呼嘯，是百萬鐵馬金戈的衝突……⁴⁸」並在其中寄託「自由中國」「不甘接受赤蝗統治的孤臣孽子」之形象：

忽由湖東傳來消息，黃裾蝶尚在人間，已攜子轉輾自蝗區逃脫，現停留在繡原東南邊的一個小小綠島上。這島上聚集的都是不甘接受赤蝗統治的孤臣孽子，日夜淬厲，準備反攻。島國的氣象光明，民生安樂，與蝗區的黑暗悲慘，形成鮮明的對比。⁴⁹

小說的結尾也以蝴蝶與黃裾蝶在島上相聚，姊妹展開新生活，來隱喻國府遷台的情況。

然而，此一以反共為結局的寓言體小說，讓我們很容易忽略小說中以蝴蝶為角色所傳達出女性主體的自我追尋，將蘇雪林的多重身分置入交織分析之中，可以看到蘇雪林在小說中藉由蝴蝶此一角色，寄託知識女性身上所隱含各種身分的張力，〈銀蝶〉此部作品也是蘇雪林多重論述位置的交集點，為一辯證與協商的對話空間，其中展示性別主體自我實現的複雜性。其一在於小說塑造蝴蝶和蜜蜂分居後和友愛彌篤的姊姊同住，所組織的「姊妹家庭」：

小小銀翅蝴蝶自從與蜜蜂分居後，與她姊姊黃裾蝶同住在一起，組織了一個別開生面的『姊妹家庭』。說故事人應該在這裡補一句話：自從蝴蝶由大湖的西邊回到故鄉，她最愛的母親是去世了，蝴蝶便將對母親的孝心完全傾注在她姊姊身上，而黃裾蝶感念妹子之情，對她也百端照料，勝於慈母。兩人友愛之篤，使看見的人都感動得掉眼淚。⁵⁰

寧願捨棄婚姻，而自組姊妹家庭，飽滿姊妹之愛，也有對於母親孝思情感的移轉，其中展現出愛情與親情的衝突拉鋸，也有性別主體自身抉擇的展現，頗值得關注。其二，文本中展現出性別話語與國族話語間彼此的拮抗到協商的過程，

⁴⁸ 同註 44，頁 59。

⁴⁹ 同註 44，頁 60。

⁵⁰ 同註 44，頁 54。

蘇雪林於作品中以天性浪漫醇厚的蝴蝶隱喻女性主體，其靈動無華之姿，帶有清雋灑脫的氣味，在此展現的是蝴蝶變形為蟋蟀的主體重塑過程：

我是匹蝴蝶，戀愛應該是我全部的生命，偏偏我在這個上僅餘一頁空白，像織不成繭的懶蠶。我是匹蝴蝶，閒暇應該是我一生的歲月，偏偏我被逼工作沒有停時，肩背上很少有輕鬆的時候，又很像蝨蠅。做眾人的乳牛，則又似蚜蟲。現在我又要做蟋蟀了。我要做個英勇鬪士，追隨君子之後，從事光復故國的大業。赤蝗一定消滅，繡原一定可以回去，我對此事，是確信無疑的。⁵¹

錢歌川曾發表對於《綠天》的讀後感，他認為〈小小銀翅蝴蝶故事〉第二篇展現出的是國族之愛：

作者對於國家觀念是很深的，我還記得在抗日作戰的時候，她首先把十餘年教書寫作的積蓄換黃金若干兩，悉數捐獻國家，以資抗戰，一時佳話傳遍全國。我們在這本《綠天》裡，也處處可以看到作者強烈的愛國心。⁵²

具有中華民族主義論述立場的男性評論家在此一文本看到的是無私奉獻的國族之愛。

然而隱藏在此一文本交織的訊息是文本中藉由蝴蝶之口多次說出「我是匹蝴蝶」，以及道出「現在我又要做蟋蟀」的堅苦卓絕，所以隱藏在文本另一層次的敘事為女性主體的自我實現，在健康、戰鬥的文藝標準下，有女性主體的兩難，特別是其在國族論述／保有自我之間矛盾的張力而終至妥協的過程，也潛藏著游移尋覓女性主體性的暗流，由此重新閱讀蘇雪林於1955年出版之《綠天》的序，蘊含之鋒芒特別值得玩味，尤其是蘇雪林自言：

⁵¹ 同註44，頁60。

⁵² 同註20，頁163。

而且覺得自己今日在文藝學術上之小有成就，還得感謝這一端人生缺欠。因為我原是個平凡的女性，倘使我的婚姻是相當幸福的，則我必安於家庭生活，以做個賢妻良母為滿足，那裡還肯像今日之堅苦奮鬥呢？⁵³

某種程度上，也可以詮釋為以蘇雪林為代表的這一輩女作家對於自我「知識女性」形象之認同與表述，以此進行自我定位。

四、謝冰瑩之多重論述位置

在《大學生活》發表作品的女作家中，謝冰瑩是另一位頗值得關注的對象，以下將深入討論以解析出謝冰瑩多重論述位置之複雜性。謝冰瑩於友聯出版社刊物中發表時期為其創作歷程的中期，橫跨其由中國輾轉來台擔任台灣省師範學院教授（1948年9月-1957年8月，1960年8月-1973年）與馬來西亞華校教職（1957年8月-1960年8月）兩個生命階段⁵⁴，此一時期謝冰瑩由台灣遠赴南洋，其足跡跨足兩地。以下探討身兼大學中文系教授與新文藝作家的謝冰瑩，其在《大學生活》上承擔名學者與名作家的社會教育之責任，以向東南亞一帶的海外青年傳揚文化，在於其身分所具有文化之典範，具有多重文化與文學意義。

謝冰瑩文學地位之代表性，來自於幾個面向，一為1929年以《從軍日記》成名的謝冰瑩，是為五四第二代女作家，可以說是1920年代新文學的先行者，也代表同一時期女性書寫的高峰，展現出新舊時代過渡時期革命女性的激進性與矛盾性，具有時代意義；二為來台後謝冰瑩承繼於北平授課時期對於新文藝課程的關切，於台灣省立師範學院首開新文藝課程以學生教導白話文寫作，並發表其文藝觀，影響者眾；三為謝冰瑩以寫實主義精神為主的文藝觀，其作品強調自我經驗出發，多少帶有自傳性質，披露自我典範性的經歷，不僅強調客

⁵³ 同註45，頁3。

⁵⁴ 謝冰瑩依作品可區分為前、中、後三個階段，前期為自1929年出版《從軍日記》至1948年來台止；中期為1948年起任教於台灣省立師範學院時期；後期為1973年自教職退休、赴美定居期間。見周芬伶編選，封德屏總策劃，〈小傳〉，《台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54 謝冰瑩》（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2014年），頁43-44。

觀真實，並具有作家的使命感以指導人生。其中可以看到謝冰瑩此一 1920 年代進步女性的典範，在文學史一向定位為與傳統桎梏對決的女作家，到遷台後於國民黨文藝體制主導論述下謝冰瑩所扮演的關鍵角色⁵⁵，偏向忠黨愛國，其文藝觀也有保守性，顯現出其「文學清教徒」的一面⁵⁶，這也突顯謝冰瑩主體建構的複雜性。然而在此要強調的是謝冰瑩在《大學生活》上除了擔任學生讀者學問知識上的「業師」，同時也扮演督促品格之「人師」，並身兼青年學子寫作導師與文化教育傳承工作，有其重要的開創性，其中可見謝冰瑩知識女性的面向，對於自我作家身分與文藝教師身分之確認與重視，延續新文學初期對於自傳書寫風潮的盛行，並將自身的創作經驗傳授給年輕人，以身教感化中學生，與鼓勵其創作文藝。這些從廣義層面上也可定義為帶有自傳書寫的雜文書寫，大多以自我閱讀、書寫與教學出發，觸及各種生命書寫之可能性，對當時東南亞整體華文教育具有一定的影響力。

1955 年李文出版之《當代中國自由文藝》，李文提出謝冰瑩的作品符合自由文藝之方向，並以謝冰瑩作品〈霧〉為例來說明自由文藝成功的作品⁵⁷。李文介紹謝冰瑩提出：

文藝青年對冰瑩的名字不會陌生，她應該被稱為老牌作家。北伐時期她是積極的革命工作者。她參軍，上前線，有女兵之稱。她的創作題材很廣泛，尤以描寫兵士生活與男女青年在大時代中思想與行動的鬥爭、戀愛故事等，特別感人。⁵⁸

在此可以看到李文對於謝冰瑩「女兵作家」身分之強調，其次，在李文筆下著重於強調這部小說的教育意涵，他指出此一以女大學生受到中共誘惑最終受折

⁵⁵ 其中包括 1955 年，謝冰瑩與蘇雪林、李曼瑰、徐鍾珮、張雪茵等 32 人聯名發起組織「台灣省婦女寫作協會」，同年成立，擔任監事。此外，1963 年郭良蕙所出版的《心鎖》遭到內政部查禁，謝冰瑩於同年 4 月中國文藝協會理事會上主張開除郭良蕙會籍，而後中國青年寫作協會及婦女寫作協會亦同時開除其會籍，謝冰瑩亦以公開信對於郭良蕙進行討伐，顯現其衛道者之一面。

⁵⁶ 周芬伶，〈女性自傳散文的開拓者 謝冰瑩的散文研究與歷史定位〉，收於同註 54，頁 132-136。

⁵⁷ 謝冰瑩，《霧》（台南：大方書局，1955 年）。

⁵⁸ 同註 30，頁 106-107。

磨而死之小說，是謝冰瑩創作傾向與手法的某種轉變，主要是「引導青年們踏上反共抗俄的康莊大道」⁵⁹，並且提示〈霧〉將引起文藝青年思想上的共鳴，特別是那些準備回返大陸的華僑青年，如果閱讀〈霧〉將大徹大悟⁶⁰，在此可以看到自由文藝文化運動中謝冰瑩被賦予對於青年思想與行動引導者的地位。值得一提的是，此書特別刊登出謝冰瑩的肖像照，照片中謝冰瑩不以溫婉嫺雅的賢妻良母形象出現，而是呈現出擁有書寫權力的女文人典型，她沒有正視鏡頭，而在窗明几淨的書桌前振筆疾書，充滿自信，呈現出作家與學者合一的知識菁英女性典範，「女作家握筆之手」成為這張照片最重要之註腳，也相當鮮明地突顯了謝冰瑩作家與學者合一的自我形象。

五〇年代台灣女作家崛起於此一文化冷戰背景下的台港文化生態，自有其歷史分量。《大學生活》是以「促進自由知識青年的聯繫」為重要的目標，認為中國文化的承繼與創發的責任，落在大陸以外各地青年知識分子之肩上⁶¹，《大學生活》作為海外及台灣學生青年交流思想的園地，使得散處海外的同學們能聲氣互通⁶²，所針對的對象不單是香港的中國青年人，也包括海外華僑青年，以整個東南亞的華僑青年為範圍。在積極層面上，《大學生活》透過提倡自由世界青年學生建立國際組織，包括：交流學術研究、留學生獎助學金消息、建立福利機構等⁶³，使得各地學生有所交往。在《大學生活》編者所撰述的〈第一年的里程碑〉中，以楊喚詩句「我歌唱：／復興的中國在明天／我歌唱：／海那邊的暗夜不會長，」來與自由世界之青年朋友相勉勵，也以「復興中國」的理想來聯繫自由世界中國青年。五〇年代台灣女作家在《大學生活》中所發表的作品，對於大學生活議題多所發揮，並融入台灣戒嚴與冷戰初期對於流亡、反共、懷鄉等主題與寫實傳統之刻劃，其主題包括三大層面：大時代流亡敘事為中心的大學生活回憶、人生理想與志業之闡發、個人的閱讀經驗或是教學經

⁵⁹ 同註 30，頁 107。

⁶⁰ 同註 30，頁 112。

⁶¹ 同註 17，頁 3。

⁶² 本刊，〈「大學生活」與「生活大學」(大學論壇)〉，《大學生活》5 卷 4 期 (1959 年 7 月)，頁 3。

⁶³ 本刊，〈擴大各地學生之合作 (大學論壇)〉，《大學生活》2 卷 12 期 (1957 年 4 月)，頁 3。

驗之闡釋，其中對於個人的閱讀經驗或是教學經驗之闡釋，也回應到台灣女作家多數具有作家／學者雙棲的「知識女性」論述位置。

《大學生活》中，台灣女作家在《大學生活》中分享創作技藝與自我文學鍛鍊的過程，進行文學與文化教育的傳承工作，包括張秀亞、琦君、謝冰瑩都以個人的創作經驗或是閱讀經驗為主題進行創作，這些以文學寫作與文學欣賞為主題之文章，主要圍繞在文化傳承與青年教養兩大方向之主題上。琦君於〈漫談創作〉分享其創作觀，一則指出文章與個人內在修為的高度關聯性；一則提出美文的美學型態，在於好文章必須做到平易近人、淨化剪接題材、蘊藉含蓄。〈漫談創作〉中在闡述文章的思想時，琦君將文學具有啟迪人生的使命感，與民族思想相連結：「文學的最高境界是光明美麗、快樂、幸福，我國的民族思想，立國精神是寬大同情和平創造，我們必須要把這種偉大的精神貫注在文學中，使我們的文學能發放燦爛的異采……⁶⁴」值得注意的是，〈漫談創作〉琦君闡釋出自幼浸濡於古典文學的領會，展示了自身所具有中國古典文學的知識系譜，這些內容不僅可以提高《大學生活》中學子對於中國古典文學的理解，也是發展大學生中國文化意識與修養的關鍵，和《大學生活》所推動的「中國文化再生運動」有深刻的連結。

〈我的寫作經驗〉為張秀亞寫作經驗談。張秀亞自述自己於村野成長，雖然後來到都市之中，但對鄉野風光的愛好是永遠充盈心中，也認為藝術品要展現出生活的深度與價值：「我更深感於文學與『生活』二者是不可分割的，而這『生活』，在文學作品中，指的是經過作者情感、心靈所濾過、透過、融匯過的生活，而非是昔年那些普羅作家，拿著望遠鏡看了一下農村，便寫農村。⁶⁵」張秀亞進一步闡釋寫作忠實的重要性：「我的寫作談不到有什麼寶貴的經驗，只是越寫，我越覺得忠實兩字的可貴；忠實於文藝女神；忠實於讀者；忠實於自己。⁶⁶」〈我的寫作經驗〉也與《大學生活》創刊號之主旨相呼應，認為寫作是一種文藝與生活的關聯，此文藝觀也強化自由中國的反共立場。

⁶⁴ 琦君，〈漫談創作〉，《大學生活》2卷4期（1956年8月），頁30-33。

⁶⁵ 張秀亞，〈我的寫作經驗〉，《大學生活》1卷3期（1955年7月），頁54。

⁶⁶ 同註65。

謝冰瑩於〈怎樣學習古文？〉提供實用古典文藝研習之方法，同時也教導為人處事的道理，符合《大學生活》所推動的「中國文化再生運動」之中華文化傳承之面向。謝冰瑩提出讀古文除了要了解作者的思想、生活與價值觀，最重要的是培養中國古典文學之修養，深入理解文化傳統之價值，以凝聚民族情感為號召。在〈怎樣學習古文？〉，謝冰瑩提供如何閱讀古文的方法，從古文思維形式、辭意結構、主題意識等諸多不同角度，多方演繹學習古文的精神，並且引領青年理解閱讀古文的審美態度⁶⁷。文首，謝冰瑩先舉出師院招生時國文翻譯題目時考生之有趣回答，來與《大學生活》青年學子拉近距離。謝冰瑩所提示出研讀古文的路徑，並非只是文藝修辭的理解而已，而是提出這些經典作品背後所連結的是中國傳統文化價值體系。學習古文之路，無非是一條觸類旁通，通往「文化中國」博大精深的路徑，與連綿不斷的中國傳統與民族文化底蘊相牽繫。文末，謝冰瑩也標示出其文化身分的象徵，落筆於「四十四年六月十八日於自由中國」，「自由中國」用以標示出「正統」中華民國政府在台灣的正當性，以固守與共產中國相對立的立場，提出自由中國文藝思想的自由性。在〈怎樣學習古文？〉，謝冰瑩提出讀古文不能以錯誤的唯物史觀去讀，指出大陸左傾教員上國文課批評陶淵明與李白為資產階級詩人的錯誤觀點，也呈現出謝冰瑩對於傳統詩文和中國傳統文化提倡之立場。

在此將謝冰瑩以自身閱讀與教學生活為素材用散文體寫成的雜文，定位為自傳性的作品。需要留意的是自傳的複雜性，作品所潛藏作者的自我表述，其中所涉及個人小敘事與宏大歷史敘事之間的對話與折衝。朱崇儀在〈女性自傳：透過性別來重讀／重塑文體？〉曾說：

自傳如今被理解為一個過程，自傳作者透過「它」，替自我建構一個（或數個）「身分」（identity）。所以自傳主體並非經由經驗所生產；換言之，必須利用前述自我呈現的過程，試圖捕捉主體的複雜度，將主體性讀入世界之中。⁶⁸

⁶⁷ 謝冰瑩，〈怎樣學習古文？〉，《大學生活》1卷4期（1955年7月），頁14-16。

⁶⁸ 朱崇儀，〈女性自傳：透過性別來重讀／重塑文類？〉，《中外文學》26卷4期（1997年9

援引朱崇儀的觀點，將謝冰瑩在〈怎樣學習古文？〉視為自傳主體的「建構性」，是為一種書寫的建構，也是一種有意識與策略性的書寫，也是其替自我建構的文化身分之一。謝冰瑩在〈怎樣學習古文？〉化身為中華文化的傳承者，藉由文化中國的宣揚以維繫國家／族群的文化想像，尤其謝冰瑩標示「自由中國」之立場，其中，謝冰瑩堅持民族文學與左翼文學相抗衡的姿態，也令我們聯想起謝冰瑩早年革命歷史，其於 1930 至 1931 年與左聯的關係，根據北方左聯作家的追憶，謝冰瑩身為北方左聯的發起人之一⁶⁹，以及 19 路軍在福建的善後委員會和後來發動之「反蔣抗日」的「閩變」中，謝冰瑩參與其中的善後委員會，任宣傳科長⁷⁰，而謝冰瑩所標示之自由中國的論述立場，是否可視為主體所採取自清與自保之策略，並以此進行自我定位⁷¹？在謝冰瑩與友人魏中天的書信集中呈現個人複雜的情感取向，可視為現在之我與過去之我對話或是拮抗的過程，也體現出其女性身分與國族複雜的關係，尤其是女性知識菁英在國族論述的主導詮釋下的協商與權宜。

五、結語

本文以《大學生活》中蘇雪林與謝冰瑩之作品為重要研究個案，來探討蘇雪林與謝冰瑩的多重論述位置，深入分析其中所展示蘇雪林與謝冰瑩論述位置之複雜性，包括知識女性所展現的思考體系，及其個人心志趨向與國族主義交纏的矛盾情結，並浮雕出蘇雪林與謝冰瑩在自由中國文藝體制，以迄東南亞華文教育中所扮演的角色。蘇雪林與謝冰瑩此一崛起於 1920 年代中國新文學文壇的著名女作家，見證並再現了五四新文學運動的風雲變幻，那種強烈的時代感和她個人漸趨明朗的女性意識，呈現出現代新女性在時代與社會生活中所歷所聞，並在國民黨遷台後成為當時自由中國文壇的女作家典範，在當時具有崇高

月)，頁 134。

⁶⁹ 朱旭晨，〈從自傳到他傳 謝冰瑩傳記研究〉，收於同註 54，頁 254。

⁷⁰ 同註 54，頁 275。

⁷¹ 在此可以關注於朱旭晨所提到的重要資料：欽鴻編，《永恆的友誼——謝冰瑩致魏中天書信集》，包括謝冰瑩與魏中天書信中所提到請魏中天寫文章，不可抹殺事實，更不可造謠，以妨礙對方安全，並提出「沒有反蔣，始終擁護三民主義」此一立場；此外由於謝冰瑩女兒小號兵死於大陸文革，使其對於大陸運動反感。同註 54，頁 276。

的地位，也創造出有別於古今中外男作家之知識女性的權威性與代表性；而蘇雪林與謝冰瑩此一女作家典型不僅填補香港五、六〇年代本土女作家尚在培育的空缺，也影響香港以迄遠東一帶眾多年輕的學子，特別是對於年輕讀者之引導上。

1948年來台後蘇雪林與謝冰瑩被塑造為忠黨愛國新女性的代表，也在推廣文學與培育創作風氣上貢獻心力，特別是其透過《大學生活》此一跨地域的發表平台，進行文學與文化傳承的重要工作，對於東南亞一帶的海外學子也具有高度影響力。蘇雪林與謝冰瑩，其以名作家與名學者身分，透過《大學生活》此一台港文化聯繫的管道，在自由中國文藝體制與美援文藝體制中所扮演的關鍵角色⁷²，也使得蘇雪林與謝冰瑩在東南亞華文教育中獲得獨特之論述位置，然而自由中國文藝體制抑或是美援文藝體制雖提供謝冰瑩創作發表之舞台，然而在其文本中卻也顯現出性別與民族論述的些許矛盾，在民族大義的巨大陰影下，女性身分與國族論述爭霸中所顯現的認同危機，也許是蘇雪林與謝冰瑩在此一時期不敢深入詰問的問題⁷³；而在自由中國文藝體制與美援文藝體制中，女作家將如何定位自我？也顯現出女性主體定位的複雜性，特別突顯出蘇珊·弗瑞蒙（Susan Stanford Friedman）所辯證出將各種身分視為充斥不同論述對抗的「身分地理」（Geography of Identity）⁷⁴。此一想像空間，也顯現出女作家在大我國族意識與民族意識下所進行之身分探尋、定位，也讓我們對於當時女作家身分的複雜性進行更深入而細緻之再思考。

⁷² 同註4。

⁷³ 此一觀點來自范銘如論述之啟發，范銘如探討中國現代性誘導女性付出巨額代價，卻是否應許女性自由幸福的承諾時，曾說：「謝冰瑩用女性經驗對國族論述發出的初步質疑並沒被重視，也許連她自己都不敢深入探詰，然而後起的女作家卻前仆後繼追上她的步履，甚至間斷性投入一些負面的看法。」同註2，頁219。

⁷⁴ Friedman, Susan Stanford, "Telling Contacts" in *Mappings: Feminism and the Cultural Geographies of Encounte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134-135.

參考書目：

一、《大學生活》相關書目：

本刊，〈大學生之所學與所志（大學論壇）〉，《大學生活》1卷6期（1955年10月），頁2。

本刊，〈新人格與新社會—新年的回顧與前瞻〉，《大學生活》1卷9期（1956年1月），頁3。

本刊，〈努力的方向—紀念本刊一周年〉，《大學生活》1卷12期（1956年4月），頁3。

本刊，〈擴大各地學生之合作（大學論壇）〉，《大學生活》2卷12期（1957年4月），頁3。

本刊，〈「大學生活」與「生活大學」（大學論壇）〉，《大學生活》5卷4期（1959年7月），頁3。

張秀亞，〈我的寫作經驗〉，《大學生活》1卷3期（1955年7月），頁51-54。

琦君，〈漫談創作〉，《大學生活》2卷4期（1956年8月），頁30-33。

謝冰瑩，〈怎樣學習古文？〉，《大學生活》1卷4期（1955年7月），頁14-16。

蘇雪林，〈我怎樣開始研究屈賦〉，《大學生活》1卷3期（1955年6月），頁12-16。

蘇雪林，〈銀蝶〉，《大學生活》1卷5期（1955年9月），頁52-60。

蘇雪林，〈卜賽芬的被劫〉，《大學生活》1卷9期（1956年1月），頁59-64。

蘇雪林，〈中印文學關係研究跋〉，《大學生活》4卷10期（1959年2月），頁39-44。

蘇雪林，〈論中國舊小說〉，《大學生活》5卷1期（1959年5月），頁3-14。

錢穆，〈在現時代怎樣做一個大學生？〉，《大學生活》創刊號（1955年4月），頁3-5。

編者，〈生活與大學生活〉，《大學生活》創刊號（1955年5月），頁2。

編者，〈一份關懷，一份愛〉，《大學生活》創刊號（1955年4月），頁48。

二、專書：

- 李文，《當代中國自由文藝》（香港：亞洲出版社，1955年）。
- 范銘如，《眾裡尋她—台灣女性小說縱論》（台北：麥田出版，2002年）。
- 陳芳明，《台灣新文學史》（台北：聯經，2011年）。
- 陳昌明編選，封德屏總策劃，《台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 51 蘇雪林卷》，（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2014年）。【
- 陳建忠，《島嶼風聲 冷戰氛圍下的台灣文學及其外》（台北：南十字星，2018年）。
- 周愛靈著，羅美嫻譯，《花果飄零—冷戰時期殖民地的新亞書院》（香港：商務印書館，2010年）。
- 周芬伶編選，封德屏總策劃，《台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 54 謝冰瑩》（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2014年）。
- 盧瑋鑾、熊志琴編，《香港文化眾聲道 1》（香港：三聯，2014年）。
- 盧瑋鑾、熊志琴編，《香港文化眾聲道 2》（香港：三聯，2017年）。
- 錢穆，《新亞遺鐸》（台北：東大圖書，1989年）。
- 蘇雪林，《綠天》（台北：今日婦女半月刊，1955年）。
- 謝冰瑩，《霧》（台南：大方書局，1955年）。
- 羅莎琳·邁爾斯（Rosalind Miles）著，刁筱華譯，《女人的世界史》（台北：麥田出版，2006年）。
- Friedman, Susan Stanford, *Mappings: Feminism and the Cultural Geographies of Encounte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

三、期刊論文：

- 也斯，〈解讀一個神話—試談《中國學生周報》〉，《讀書人月刊》26卷4期（1997年4月），頁65-75。
- 王梅香，〈美援文化體制下的《文學雜誌》與《現代文學》〉，《台灣文學研究學報》第25期（2014年12月），頁69-100。

衣若蘭，〈論中國性別史研究的多元交織〉，《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第 30 期（2017 年 12 月），頁 167-228。

羅秀美，〈小說家之外的孟瑤——從「女性散文」與「孟瑤三史」論其文學史定位〉，《興大人文學報》第 51 期（2013 年 3 月），頁 197-240。

朱崇儀，〈女性自傳：透過性別來重讀／重塑文類？〉，《中外文學》26 卷 4 期（1997 年 9 月），頁 133-150。

附錄：《當代中國自由文藝》中所刊登謝冰瑩之肖像

